

《天下归心——“大一统”国家的历史脉络》导读第四讲 精彩发言集锦（之二）

8月12日晚，“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读书”活动的第三单元读书会在线上举行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（中华文化学院）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李勇刚围绕《天下归心——“大一统”国家的历史脉络》一书的第五章及结语内容进行导读。

导读环节，李教授通过讲座视频、PPT、音频、文稿相结合的方式全面细致地讲解了相关章节内容。集中讨论环节，群内读者纷纷分享了读书心得，并就会前设置的三个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。

全国政协委员陈百灵：中华文明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和农耕文明，随着文明的兴盛，逐步向北向西与游牧文明相融合，向东向南于海洋文明相接触，由于东亚地形因素的特殊性，也导致中华文明呈现出农耕为主、游牧为辅、海洋文明为补充的特质。中国文明的地理版图起初仅限于黄河中游，随着文明的不断融合，周边的各民族逐步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，而且很多民族在入主中原后也积极开拓疆域，例如元朝的蒙古人、清朝的满人等；中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，同样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努力，譬如元朝和清朝的政治文化，一样为后世所承认；在此基础上，孕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，在面对外来列强侵略和蚕食时共同携手抗争。由此，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，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，也符合当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，也必将为各民族带

来更加美好的生活。

对于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实际上在宋朝以后，我国的经济特别是技术优势地位就开始出现了下降，直到近代遇到了兴起的西方文明的冲击。仍旧呈现农牧业文明技术力量的中华文明人均产出长期没有进步，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人均产出在工业革命之后大幅增长，此消彼长导致我国遭遇降维打击。这一过程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。中华文明虽然遭遇打击，但文明特质中讲求秩序稳定，注重人的群体诉求，善于动员人民力量等优点与西方文明中讲求竞争中合作，注重个人权利维护，注重技术进步，善于创新的特点，是可以互相借鉴、互为补充的。

国家图书馆刘子晨：一直以来，我看到地图里面中国每一个省的边界都是曲曲折折，曾经疑惑“难道横平竖直的边界不是看起来更整齐吗？”直到我学习了第五章以后，才了解到省的建制原来包含很多学问！元朝的行省制和“犬牙交错”取代“山川形变”是打破地方割据、维护“大一统”格局不可或缺的力量。元朝也为今天的大一统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清朝的“统战艺术”为今天我国多民族“大一统”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借鉴意义。大一统代表的是感化，是多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融合。“和”才是各民族发展共赢的永续大计。

三门峡政协刘凯波：结合李老师提出的，“中华文明面临的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’之本质，实际上是工商业文明对农牧业文明的降维打击”的观点，本人有以下认识，共同交流。

关于“文明”的定义很多，各有各的侧重点，我以为“文明”刻画的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某一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，它反映并制约着当时当地人与人之间、人与自然之间全面而丰富的关系，当然，最本质关系应当是生产关系。

笼统地比较一下。农牧文明，都是所谓的“靠天吃饭”的文明，尽管人类自己的劳动在某些程度上作用是异常巨大的，但是人们总认为成果是“自然界的馈赠”，自己的劳动充其量只是一种辅助的功能。那种“自给自足、没有大规模协作”的小生产方式，一方面决定了人与自然的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关系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人匍匐在自然的面前；另一方面决定了人与人之间依赖关系，比如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，决定了人对人的依附关系。由此产生了与当时小规模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道德伦理关系、法治关系等等。

相比较而言的由西方开启的近代工商文明，是一种“扩张型”文明。随着人类劳动力的提升，人类在面对自然界时，自己的主体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，人类第一次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出自己强大的力量，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发展，物质财富的惊人创造，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”蔓延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，促进生产方式的巨变，生产能力的提升，最终确立了以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”的近现代工商文明。在这种生产方式主导下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，人一下子由农牧文明时，自然的奴隶或产儿，变成了人是自然界的主人。于是有近代培根提出的：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口号。在当时语境下，培根提出的“知识”特指狭隘的“自然知识”，

而他的目的也仅仅是指，了解并掌握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，进而探索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，为有产阶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。那么，这种文明下的社会关系，都是利益关系，一切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的增殖。

工商业文明的生产力类型，促进科学的发展，技术的更新，科学技术所显示的“征服力、强制性”立马在遭遇不同类型文明的民族和国度中发挥出来，所以工业文明的国家向农业文明的国家宣战，那打仗简直就形同于打猎：一边是大刀长矛，毫无组织毫无纪律；一遍是坚船利炮，组织性强协调性高，结局不言而喻。

当然，以上也仅仅是从器物层面分析，还有制度层面，文化层面等等，同时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进一步到文化层面的层层深入，也反映了人们由浅入深的认知过程。所以，说是工商业文明对农牧业文明的降维打击，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华民族灾难史，既是一部中华民族的“流亡史”，更是一部中华民族以“救亡图存”为主题的“探索史”。这段历史可以说很形象地显示出两种不同文明的交锋。

当然，两种不同的文明各有优点和缺点，正如总书记所说，“文明没有高低、优劣之分”，新时代新文明需要海纳百川，集众所长。比如，工商业文明先进的生产方式，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，给自然界带来的难以补救的创伤，今天的全球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等等；农牧文明低下的生产方式所孕育的天人合一，人与自然和谐相生、万邦协和的理念等等，这都需要我们辩证看待、具体分析。

对两种不同文明相互关系理解也为下一个问题：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”的路径选择预留了思考的方向和空间。

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理论，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，不管是从思想来源、社会基础、阶级基础等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，是绝对不可能在农牧文明中产生的。它本身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工商文明的“反叛”或“整治药房”，契合了历史发展的大势，适应也指引了近代中国“何去何从”的时代问题，帮助中国解决了“救亡图存”的时代问题，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立国之本。

作为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的文明国度，特别是在提倡“文化自信”的新时代，我们一方面需要时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，另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自身的传统文化，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创新性发展、创造性转化。这里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，比如传统文化“优秀不优秀的标准”是什么，哪些是优秀的，哪些是属于糟粕？比如传统文化中的“男尊女卑”“三纲五常”，再比如传统文化中的“万邦协和、天人合一、仁义礼智信”等等。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和还原每一个概念、命题、论断提出的具体语境的同时，严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去筛选辨别中国传统的文化，以顺势时代发展、满足人民需求，指引实践创新为方向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、创造性转化，满足新时代国人对美好精神食粮的需求。

李勇刚回复：感谢刘老师的如此详细的分享！总的说来，在人与

自然的关系问题上，农牧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确实不可同日而语。不过，农牧业文明中，人与自然、人与人是否就是纯粹的依赖关系？或许还可以进行更细密的探讨。就我所知，在漫长的农牧业时代，生产技术也在不断进步，依赖的程度也在逐步降低，这个情况也值得注意的。最终累计进步的结果，使得石器时代的农牧业和铁器时代特别是其后期的农牧业，仍然有重大差别，而这也会影响生产关系、组织形态和政治制度、文化结构等。您也关注到工商业文明给自然界带来的“创伤”，我觉得这个层面还可以深挖。或许农牧业时代积累的智慧，经过创造性转化，依然能为化解这些创伤提供某种时间意义上的“他山之石”。

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，您的思考也很有启发意义。辨明优秀和糟粕是必要的，此外还需要从具体的文化成果中、从中西文明对比中，去体认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、思维方式等，并结合现在的时代背景和突出问题加以运用。